

中國史學家評傳

陈清泉 苏双碧 李桂海 萧 黎 葛增福 编

上

陈清泉 苏双碧 李桂海 萧 黎增福 编

中國史學家評傳

周谷城題

上

内 容 提 要

《中国史学家评传》分上、中、下三册，分别评介从春秋到五代，从宋代到清中叶（鸦片战争前）和近现代已故中国著名史学家八十多人的生平事迹、史学论著。全书约一百二十万字。

本书在评介各史学家的生平事迹时，实事求是，简明中肯。其重点在于从史学思想、治史态度、历史编纂学等方面，对各史学家的史学、史才、史识、史德进行全面的评述，以阐明各史学家及其论著在我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的贡献、地位和影响。全书资料翔实，理论性强，观点鲜明正确。适合于高等院校文科师生，以及其他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爱好者研究、阅读。

上册评述从春秋到五代的著名史学家二十六人。

中国史学家评传

上 册

陈清泉 苏双碧 李桂海 肖 黎 葛增福编

责任编辑 后 录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 15印张 347千字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730册

统一书号11219·32 定价2.75（平）元
3.85（精）元

序

《中国史学家评传》即将出版了。我希望这部书对于继承祖国史学优良传统，起一些积极的作用。

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有不少东西还有待于挖掘。比较显著的优良传统，我觉得至少有三点是值得我们继承的。

第一是写出历史著作。这是历史工作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我们研究历史，就是要把研究的成果写成历史著作，给更多的人看。如果一个史学家不把研究的成果写出来或者是写出来而不让大家看，这只能说是个人的爱好，对于社会是没有意义的。我国的优秀史学家把他的历史著作留传下来，丰富了祖国文化的宝库，也对现实社会有这样那样的影响。从司马迁起，就是这样做的。中国史学有自己的历史，首先就是靠这些历史著作，作为发展的主干的。对于这一个传统，我总觉得继承得不够。我们不能满足于资料的汇编，也不能醉心于史料史事的考订。这些工作，对于研究历史都是需要的。但从史学的整体上说，我们还应该把历史著作放在首位，要把写历史著作看得比这两项更为重要。

第二，我国优秀的史学家，重视社会理想。这对于历史工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学历史，可以得到许多文化知

识，可以从历史中得到许多智慧，这都是学历史的很大好处。但更贵重的，还是史学家的社会理想、史学家对于历史前途的关注。《易传》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就是说从历史中可以得到许多知识，从中培养自己的品质、能力。《诗·大雅》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就是说总结经验，可以从中吸收经验教训。这都可见，在很古的时候我们的先民已经很重视历史知识的作用。《易传》又说：“彰往而察来”。司马迁说：“述往事，思来者”。这就是学习历史不只要知道过去的事情，而要从观察未来，这就关系到史学家的理想了。在《史记》里，司马迁有好多论断，有好多是通过历史的表述来体现其思想的，其中有不少表述了司马迁的社会理想。正是因为有了理想，《史记》的全书都被调动起来了，使我们在二千年以后还感到这书有蓬勃的朝气。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能满足于史事的表述。我们也不是客观主义地研究过去历史的规律，而是要用于观察历史的前途，其中包括祖国历史的前途和人类历史的前途。我们以此来教育群众，并且也以此进行自我教育。这一点当然是过去史学家所谈不到的。但“述往事，思来者”的思想是中国史学家的珍贵遗产，我们应该十分重视它，并且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把这一遗产发展到新的水平。

第三，中国史学家对史料的审慎的考订，在我国史学史上有长久的传统。由宋到清，这方面有更多的发展。近几十年，我们的前辈史学家又在某些领域里作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近几年，年轻的朋友们有相当多的人是热心于考据的，但不能严肃对待这个问题，不重视前人及当代人已经取得的成果，这都是很不利于工作的。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还是应当学习前辈的榜样，并发展到新的水平。

当然，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对史学工作提出新的要求。我想在这里提出两点。第一点是：继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还应该结合中国历史实际，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历史有跟其他国家、地区共同遵循的规律，也有自己的独特规律。而且在中国各民族之间，也各有自己的历史特点。这期间不知有多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提到的。这都须我们进行认真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得出新的结论，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词句代替对历史的具体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断在未经切实研究的历史问题上生搬硬套，这都是不足取的。第二点：我们的史学工作，除了应该加强专门研究外，还应该大量提倡普及的工作。我们写文章、写书，不能只给同行们看，而要给更多的人，给越来越多的人看。我们有八亿农民，我们如何把历史知识普及到农民中去，这关系到我们工作的广阔前途。我们在这方面，不只是做得很少，而且是想得也很少。现在是我们应该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现在，《中国史学家评传》要出版了，我在这里写了这些意见，我想，这不会是离题太远的，而且是应该说的。说得不一定对，请同志们批评。

白寿彝

一九八三年元月十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白寿彝 (1)
孔 丘	骆承烈 (1)
司马迁	肖 黎 (18)
刘 向	林剑鸣 赵志汉 (53)
班 固	安作璋 (71)
荀 悦	刘隆有 (98)
陈 寿	缪 钺 (113)
常 璩	刘 琳 (127)
袁 宏	周天游 (141)
裴松之	杨翼骧 (159)
范 晔	赵志汉 林剑鸣 (184)
沈 约	刘静夫 (210)
酈道元	段熙仲 (227)
萧子显	周春元 (245)
魏 收	童 超 (261)
崔 鸿	朱大有 (275)
李百药	张祥光 (288)
李延寿	杨耀坤 (302)

孔 丘

——骆承烈——

孔子是我国春秋末年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活动家，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史学家。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年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 551 年，鲁襄公二十二年），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 479 年，鲁哀公十六年）。孔丘的先世，他能上溯到商朝的先王以及更早时期的人物，证明自己的家世有着悠久的历史。他的祖先正考父曾受命为宋国的上卿，是宋国贵族。曾祖孔防叔逃难到鲁国，父叔梁纥是鲁国的一个勇士，做过陬邑大夫，但在孔丘幼年时他便死了，家庭也没落了。因此孔子自称“吾少也贱”，即出身于没落贵族之家。他早年在鲁国当权的贵族季孙氏手下做过看管牛羊的乘田和管理仓库的委吏，中年做过中都（今山东汶上）宰，后升任鲁国的司寇。鲁定公十年（公元前 500 年）鲁、齐二君夹谷之会时做过鲁君相。孔子处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春秋末年，他站在鲁国国君的立场上，在鲁国想要削弱以季孙氏为首的私家势力，维护风雨飘摇的公室。因遭到新兴势力的反对而去职，从此便到齐、卫、宋、郑、陈、蔡、楚等国周游，到处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但却未为人

采纳。在外游历了十四年后，终于又回到故乡，整理文化典籍，编撰史书，致力于教育事业，直到老死。

鲁国是西周奴隶制政治文化中心之一，保存了大量宗周的典籍和文物。孔子自小就勤奋好学，到处拜师，不耻下问，认真钻研思考，又经过多年来的政治实践，至晚年，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主张，因而创立了儒家学派，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并且远达国外。

孔子在钻研宗周的典籍和文物制度后，浸沉在宗周的礼乐中。他想要恢复宗周的制度，因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反对当时天子失政，诸侯擅权，“政在大夫”的社会现象，尤其反对各种“犯上作乱”的越轨行动。他为了贯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主张，提出了一个改造社会的办法，便是“仁”的思想。他不但把“仁”当作人们应达到的最高思想境界，还把“仁”当作一个人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自然也把“仁”看作治国安邦之道。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到他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他主张统治者“为政以德”，要当权者“利民”、“富民”、“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使民也义”，“养民也惠”，“使民以时”，反对“苛政猛于虎”。即在保护奴隶主的统治的前提下，让奴隶们得以活下去，才能供奴隶主们剥削和防止奴隶们造反。这种主张显然比那些奴隶主一味残酷剥削，使奴隶们没法生活下去要好一些。他对历史上的统治者也是持此看法的。

作为思想家的孔子，他有一套较为完整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体系，他力求协调社会上各种矛盾，以求巩固奴隶制统治，这种主张也体现到他对历史的看法上。

孔子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活动。他的教育思想、教育原则和教学方法，在中外教育史上都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他

创办私学，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孔子办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人才，即其心目中的“君子”、“成人”、“贤才”。他创立了一套我国古代典型的教育体系，内容繁多，形式复杂，包罗宏富。他为了达到自己既定的教学目的，经常引用历史的材料，因此其教育思想与实践也是与他对历史的研究和评论分不开的。

(一)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史学家的孔子，他的历史观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虚心好学，广泛搜集历史资料，不断增长自己的知识。

孔子的学识是很渊博的。他学问的获得是虚心好学的结果。他曾自诩“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①。他认为人的聪明才智不是天赋的，自己也不例外，“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②，因此自己就要虚心向前人学习，学习古代的礼制、典章制度，学习古代的历史，了解前人，吸取前人各方面的优秀成果。他在年少时曾“入太庙，每事问”^③，年长后“敏而好学，不耻下问”^④，认定“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⑤。到了老年，仍表现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学习劲头^⑥。

当孔子三十多岁，在鲁国有了一定声望，得到贵族的赏识，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后，马上又争取到一个到洛邑学习的机会。当时在京都洛邑任守藏史（类似国家图书馆或档案馆馆长）的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归，再加上他那里有丰富的典籍、资料，孔子早就想前去就学，一有机会便欣然前往。今

山东嘉祥武氏祠“孔子见老子”的画像，生动地体现出两人会见的情景（此画像石现存济宁市汉碑馆）。头戴高冠、身着长袍的孔子，手捧贄礼（一只雉）正在拜见老子。老子亦高冠长袍，拄着曲足杖，前来拱手相迎。后面三人手捧简册，即表示老子令人拿出文籍档案供孔子翻阅。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虚心求教的形象。《庄子·天地》及《天运》两篇中，对孔子见老子之事描绘甚多，其中大讲了一通道家的哲理，固不足取，但这些记载却成为孔子见老子的一些旁证。

鲁国是当时文物典籍保存最完整的国度之一，孔子在这里已读到一些罕见的典籍，见识过古代的一些礼制，但还不满足，他主动地去“多闻”、“多见”、“多识”，学习更多的东西。如到齐国后，马上去闻“韶乐”，听过以后，给以很高的评价。正因为他能广泛地学习，不断增长知识，才打下了成为史学家的坚实基础。

二、不发空论，言必有征，研讨问题时重视古代的资料和实物。

孔子不停地勤奋学习，具备了广博的知识。但他从来不凭自己见多识广去妄言，而是言必有征，相信和依靠古代的文献和实物。有时也为文献不足而忧虑。他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①。因为杞、宋所保存夏、殷的文献太少，以致不能详究夏、殷的历史。如果这些材料充足的话，那就一定会研究得更好，即“足，则吾能征之矣。”因材料“足”而能“征”，即材料充分便于历史研究的例子当然也有。如《论语·尧曰》中几百字的“尧曰”章，就是征引《尚书》所记，具体形象地说出了自尧舜至周以来的历史情况。

记载孔子注意研究历史、文物的例子很多。如在《国语·鲁语》中有如下的记载：

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楷矢贯之，石弩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

“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

接着孔子又将西周初年肃慎氏怎样进贡石弩楷矢，周王怎样分赐给功臣，陈侯怎样分到一份的事说了一遍。并告诉陈侯“求诸故府”（库房）即可得到。陈侯派人去找时，果然找到此物。

同书又记“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王派人来向孔子询问时，孔子说“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同时孔子又向来使回答了关于防风氏当年的职守等一系列问题。

同书还有一个“季桓子穿井得鬶羊”的故事，与此略同。《荀子·宥坐》记“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从观察这一古代器物悟出为人之道：“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孔子“观欹论道”固然有些说教成分，但他对这种古器物空则斜，满则复，只有将水注入一半才能端正的特点了如指掌，也可看出其对古代文化很有研究。

三、反对强不知以为知，主张对历史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孔子研讨历史时，不但重视根据，而且“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是不懂装懂，反对那种强不知以为知及“不知而作”的作风，而是持着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我无是也”^⑤。就是说他表示自己决不做那种不知而作的事情。这句话里还体现出选择史料的具体方法。即不但不要无根据地乱说，

即使有了根据，也要对这种根据（所获得的史料）进行辨析，选取对的，摒弃错的；选取有代表性的，摒弃对说明问题无补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多见”，即实际了解。

有一次，他的学生子张向他问起求官职、得俸禄的办法时，他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⑨。意思是说：遇到事情多听听，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其余足以自信的地方，谨慎地说出来，就能减少些错误。多看看，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其余足以自信为正确的，谨慎地实行，就能减少懊悔。如果这样做的话，一个人言语的错误少了，行动的懊悔少了，官职、俸禄自然在里面了。这段话虽然是孔子对学生说的为官之道，但却也体现出他处理一切问题的态度。即多了解情况，获得第一手的材料，肯定其正确部分，对不足的地方加以保留。遇到事情切勿轻易下结论，防止急急忙忙说错了话。孔子对待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也持这样的态度，这自然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列子·汤问》中有一段童子问日的故事：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两个小儿的争辩，各有理由，孔子并不自恃识多见广或以成人自居，对他们瞎说一通，而是默不表态，这又从一个事例体现出他实事求是的精神。

四、认为历史在不断发展变化，而且代代相续，即承认历史

发展的继承性。

孔子认为维系社会生存的是“礼”，社会发展就是“礼”的变易。随着“礼制”（在他眼里看来，包括典章制度等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变化。有一次，他的学生子张向他问到“十世可知也”，就是说由此后推十代的事情，人们能知道吗？孔子为此发了一通议论，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⑩这就是说，礼制在不断发展，历史在代代相续。既然殷能继夏，周能继殷，那么周的后世也一定能够继周。当然他这里明显的错误是把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归结为上层建筑的“礼”，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但他在认为“礼”可以发展这一点上却有其可取之处。又如当他谈到齐、鲁两国的社会状态及他自己的理想主张时，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⑪，在这里他要社会发展较快的齐国向发展缓慢的鲁国学习，他的理想政治（道）又是西周初年繁盛的奴隶制。这一主张固然明显地体现出他恢复当年奴隶制盛世的保守思想，但他却认为历史在不停地向着理想的社会发展，历史不是停留在一点上，也不是循环往复无穷，更不是越发展越后退，而是越发展越趋于理想，越发展越进步（当然他“进步”的标准并不正确）。他还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⑫，更明确地体现出他把周当作夏、商两代优秀文化的继承，因而出现了空前繁盛的、前人无与伦比的文化，以致于他把具有这种文化的西周盛世当作自己理想社会的标准。而与孔子几乎同时的老子呢？曾提出“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甚至“剖斗折衡”，毁灭文化，拉社会后退，直至退到远古那种“小国寡民”，人们“老死不相往来”的境地中去。这种倒退的历史观，和孔子的思想显然不能同日而语。《孟子》中当议论到

“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于殷也”时，引“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一也’”^⑬。则从另一个角度说出孔子论证唐、虞、夏、殷、周相互继承和发展，代代继承、传递的思想。至于人们常引用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⑭一句，当然更不是单指自然界的流水不息，而是寓意世间的事事物物总是在不停地发展、变化，历史也在不停歇前进的道理。

(二)

作为史学家的孔子来说，他在研究历史时，有一些自己特有的方法。主要表现为：

一、征引古人古事，提倡效法先王的“仁”、“德”。

在孔子的言论中，经常说起先王之道，称引先王，歌颂先王，以先王作标准来推行自己的“仁”、“德”思想，即托古改制。如他称道尧、舜的盛德：“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⑮。他把尧比作和天一样的伟大，和地一样的广阔。他说尧的功勋太崇高了，老百姓简直不知如何来称颂他好。他的恩德是什么呢？在另一篇《尧曰》中记载尧禅位于舜，以及告诫舜：当天命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要“允执其中”，即办事中正、公道。要想方设法使四海之民富有。如果由于执政者措施不当，出现“四海困穷”的景象，上天给你的高位也就中止了。

孔子对舜、禹称颂“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⑯，是说舜、禹虽富有天下，贵为人主，但心里却始终想着百姓，而不去想自己的美德。“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⑰？是说舜不过分

地扰民，实行无为而治，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达到“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他还认为具体治国之道莫过于任用贤才，“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⑧，舜能“选于众，举皋陶”。贤才当政后，不仅使天下大治，而且还能使仁者亲近，“不仁者远矣。”至于仁政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在评论禹时说得很清楚：“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⑨。就是把节衣缩食，不贪图享受，为人们谋福利视作“仁”的主要内容。更具体些说“禹稷躬耕而有天下”^⑩。在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重视和自己亲身参加劳动的人，能够当天下的共主是理所当然的事。孔子又说到周的先王传到泰伯时，泰伯此人“可谓至德也已矣”，其主要事迹是当知道别人是贤才时，自己不争名利，“三以天下让”，使季历得位而传文王。到了周文王时，其德又达到了顶点，主要表现还是任用贤才。周文王用了十个贤才（其中还包括一个妇人，其妻太妊，帮助他教育出一些有作为的儿子。）于是他便德布四方，力量日益强大，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⑪，后来灭纣建国。

总之，孔子心目中的“圣君”，无不是以“仁”、“德”治天下，致使当时仁者当道，佞幸远遁，出现升平之世。很明显地告诉人们，应以古代的帝王之治术来治理天下，要推行“仁”、“德”，施行贤人政治，去除暴政，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二、评论历史人物，树立当代从政及为人的标准。

在孔子的一些言论中，多次提到他以前的一些历史人物，征引他们的言论，叙述他们的故事，并进行了一定的评论，这种做法自然也是为自己的政治观点服务的。例如：

赞扬伯夷、叔齐这样的“贤人”。《论语》中孔子曾有五次赞扬过伯夷、叔齐，在于表彰他们礼让为国，不争天下，直至为